
论长衡会战第二阶段战役

——从长衡会战结束时间的角度考察

柯育芳

长衡会战的结束时间,国内外学术界均以1944年8月8日衡阳沦陷为准。而笔者以为,8月8日衡阳沦陷只是中国第十军方先觉部保卫衡阳城战斗结束,还不能表明整个长衡会战已经结束。长衡会战至少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5月27日到6月19日,中日双方以争夺长沙为目标在湖南北部地区作战,又称“第四次长沙会战”。第二阶段,从6月20日到9月初,中日双方以争夺衡阳为目标在湖南中东部地区作战。长衡会战的结束时间为9月初。

长衡会战第二阶段,有4个战役同时进行。它们既独立存在,又互相联系。这4个战役是:中国第十军衡阳守城战,简称衡阳保卫战;中国第九战区主力在湖南攸县、茶陵、醴陵、安仁、耒阳等湘江以东山区和江西萍乡、莲花以对日反击为主的作战,简称茶陵反攻战;中国第六战区第二十四集团军王耀武部主力在永丰(今湖南双峰)、湘乡、宁乡等湘江以西地区的攻势作战,简称双峰作战;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以李玉堂兵团为基干,在衡阳西南、西北近郊增援衡阳解该城之围的作战,简称衡阳解围战。这4个战役在战略上是一个整体,故可合称为广义的衡阳保卫战,或衡阳大保卫战,或衡阳会战。^①

蒋介石对长衡会战第二阶段作战的总设想是:两边夹,中间

^①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9页。

堵,将日军击溃于衡阳附近。这里的“两边夹”前后有变化。6月20日军委会电令“以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①但日军迅速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23日即兵临衡阳城郊,并迅速以两个师团进攻该城。蒋介石一度犹疑、观望(主要是对敌情不明)。至7月12日,“两边夹”的战略变更为:以李玉堂兵团(第十军除外)由衡阳西南地区向东,第九战区主力在湘东山区向西,“各向预定目标猛攻”。^②22、27日,军委会电令则以第七十九军主力和第一军第十九、五十八师由永丰、金兰寺向东即衡阳西北郊猛攻。^③这里的“中间堵”前后也有变化。6月20日,军委会电令“于淥口、衡山东西地区持久抵抗”,并以“固守衡阳”作最后堵击。这时蒋介石对日军主攻方向不甚明了,6月30日电分析日军将“三路袭击零陵”^④;7月1日虽发觉日军“似有夺取衡阳,打通粤汉路并窜桂林企图”,但并未将大军调至衡阳。

直到7月25日,蒋介石对日军的作战企图才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敌军对衡阳之战术,是用分散与牵制之法,使我守衡阳之军久困城中,待弹尽援绝,而后垂手以得,此应设法粉碎之。”^⑤可是,为时太晚。日军第十一军主力此时正回师衡阳,准备对衡阳城作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总攻。

由以上可见,蒋介石虽然重视衡阳的得失,称它为“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⑥,却一直将主要军力置于衡阳东西地区,企图重演前三次长沙会战的态势,所以,“中间堵”只用了1

① ②③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8页;第1260页;第1260—1261页;第1259页。

⑤ (日)古屋奎二著:《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页。

⑥ 同上书,第366页。

个军,而“两边夹”则先后投入了13个军以上的兵力。^①

日军的作战构想是:对湘江以西地区取守势,集中主力歼灭位于湘东山区中国第九战区主力,而对衡阳则作为要地予以攻占并确保。^② 日军认为:“战局的关键在于衡阳,长沙之间敌军侧攻的决战。估计攻下长沙后不致立即出现侧攻,而在进攻衡阳时,当面重庆军将会全力展开”^③,而“来自第六战区的增援和侧击,虽然也要考虑,但……敌实力已不甚大。只有第九战区的侧击部队为我主攻,必须以最精锐的第三、第十三师团部署于东翼,以便相机围歼敌军”。^④ 因此,日军第十一军6月20日便以两个师团进攻衡阳,3个师团进攻湘东山区,1个师团进攻湘江以西。^⑤ 日军第一次进攻衡阳失败后,明确提出:“无需急于攻取衡阳,使敌方多少抱有收复失地希望,诱其反攻,以便围歼敌中央军主力于战场附近。”^⑥ 17日又提出:“敌第九战区军为坚守衡阳以全力转入攻势,彼我决战即将进入高潮,敌反攻重点似在茶陵及醴陵方面……本军须抓住时机,围歼醴陵、茶陵、安仁附近敌第九战区军的主力。”^⑦ 于是,日军增派第三十四师团到湘东山区,使该地区日军仅步兵即达36个大队,而进攻衡阳的只有15个大队,其余30个大队担任警备和构筑道路。^⑧

7月下旬,日军第二次进攻衡阳失败。中国统帅部则投入6个军共9个师^⑨ 企图解围衡阳。日军第十一军遂紧急调集3个师团至衡阳近郊,以加强对衡阳城和中国解围各军的进攻力量。

① 根据蒋介石的作战部署,结合实际作战过程,可以查到以下部队曾参加过“两边夹”:第七十二、五十八、六十二、二十六、二十、四十四、三十七、七十三、七十九、一、四十六、九十九、七十四军。另,第五、九十二、四军各一部也曾参加。但前述13个军每个军是否投入全军兵力有待进一步考证。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湖南会战》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页。

③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6页。

④ ⑤⑥ 《湖南会战》上册,第14页,第88—89页,第134页。

⑦ ⑧ 《湖南会战》上册,第154页;第152页。

⑨ 姜克夫编:《民国军事史略稿》第3卷(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26页。

直到此时,中日双方的作战重点才转到衡阳城及其近郊。也就是说,长衡会战第二阶段前期 30 余天始终以湘东山区带有决战性质的作战为主,衡阳不是主战场。衡阳及其近郊因带有决战性质的作战而成为第二阶段作战主战场的时间,是 7 月底至 8 月中下旬,而不仅仅是 8 月 8 日以前。关于第二阶段作战的时间、地点及规模,可参见下页表一。

8 月 8 日衡阳沦陷后,蒋介石并未放弃反攻衡阳的企图,中国参战各军也未停止 8 月 2 日开始的攻势作战。^① 所以,衡阳陷落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军继续向衡阳近郊增援,其余大部也遵令向当面日军猛攻。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据日本战史记载:8 月 8 日,“企图使衡阳解围的敌军,仍在继续顽强反攻。同时配有坦克和高射炮的汽车载运部队经祁阳—衡阳道路东进,今晨其先头部队已到达二塘(衡阳以西 8 公里)”。^② 9 日,“敌机械化兵团就出现了”^③ (指中国第五军第四十八师)。这样,中国军参加衡阳解围战的总兵力即达 7 个军共 13 个师。^④ 因此,日军第十一军参谋部提出:“衡阳城纵然攻克,但是只有歼灭其周围的重庆军才是第一期作战的主要目的,现在正是绝好的机会。聚集在衡阳周围的重庆军必将为夺回衡阳而积极行动,大有可能予以围歼。其兵力到 8 月下旬估计有 15 个师。”它认为,“完成此次作战的最终成果,就在于衡阳周围歼灭战(指本文所称 8 月 8 日以后的解围战——笔者注)”。^⑤ 从这里可明显看出,日军第十一军将

① 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第 1 册,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筹) 1985 年编印,第 151 页。

② 《湖南会战》下册,第 56 页。

③ 同上,第 70 页。

④ 它们是:第三十七军第六十师;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一、一五七师;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一九四师;第一军第十九、六十三师;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五十八师;第四十六军第一七五、新编第十九师;第五军第二、四十八师。据日本战史记载还有:第九十九军新编第二十三师;第九十二军暂编第五十六师。

⑤ 《湖南会战》下册,第 71 页。

处均为笔者综合各种资料而推断的数字。

12—14日,日军第十一军命令:第三师团“确保耒阳,在适当时机击溃当前之敌”,第十三师团进军湘江西岸,第四十师团等“歼灭”两路口(衡阳西北25公里)东南地区中国军,其它各部“秘密”前进,以摆好下一阶段作战的有利态势。^①因此,中国战史载,13日衡阳近郊再度爆发大规模战斗。^②仅仅在两路口地区的战斗即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20日,据日军观测,中国军“东进部队”开始减少。此时,中日大致在雨母山、何家畈、七里山、上栗塘、二塘等地(相距衡阳皆在8公里左右,为衡阳解围战8月8日以前数度激战、反复争夺之地)对峙,出现了战场上暂时的沉寂。

蒋介石9日才正式知晓衡阳城沦陷和第十军“被俘”的情况。18日,他亲自视察湖南前线,了解到湖南中国军处于劣势的真情,返回后命将在贵阳的野战重炮60门运至宝庆(今邵阳市),无奈难以运出。蒋自知长衡会战败局已定,中国军无力回天了。他电令全军于20日上午6时各在军旗前为衡阳陷落默哀3分钟。^③23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表战报称:“衡阳地区的日军开始了新的行动,分成两个队,一队衡阳西北约40公里的渣江,另一队从衡阳西北约30公里处,正在分别进攻中。”^④蒋介石适应形势的变化,24日明令以洪桥(今湖南祁东)为中心沿湘桂路两侧组织防御。^⑤直到此时,中国军才完全放弃了反攻衡阳的企图,衡阳解围战才真正结束。

8月8日以后的茶陵反攻战,据中国战史记载:13日中国军克

① 《湖南会战》下册,第73页。

② 张其昀:《抗日战史》,“大事记”部分,引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第1册,第426页。

③ 《新蜀报》1944年8月20日。

④ 《湖南会战》下册,第101页。

⑤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299—1302页。

复莲花, 30日攻入茶陵, 9月1日攻入醴陵。^①其间, 中国第九战区还以主力一部沿湘江和舂陵水阻击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的南下和西进^②, 战斗激烈。

日本战史记载: 8月9、11日, 日军第十三师团第六十五联队在泉溪市、杨名桥、霞山岭(皆距衡阳10多公里)与中国军激战。^③中国第五十八军则齐集醴陵、萍乡, 准备组编突击队夺回醴陵, 第七十二军则进抵醴陵以南, 使该地区中国军总兵力超过8个师。第二十、四十四军则进攻安仁、莲花。^④

安仁地区的战争最激烈。15日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六联队、骑兵第三联队及第三十四师团一部开始大规模阻击中国第二十军的反攻。至21日大规模激烈战斗屡次展开, 中美空军则连连出击, 日军处境难堪, 以致日军“师团长山本中将对分散在耒阳、安仁两方面部队的集结和准备下期作战(指洪桥战役和桂柳会战, 笔者注), 煞费了苦心”。直到26日, 日军才得以重新进入安仁南部, 对反攻的重庆军继续进攻。^⑤中国第九战区增调第九十九、一六二师协同第二十军作战, 日军则抽集第三十四师团主力, 将中国军压向安仁至耒阳道路以东。

为了抵御中国第九战区的反攻, 日军命第十一野战补充队(相当于旅团)进攻萍乡、醴陵, 第二十七师团由醴陵进攻茶陵, 向耒阳推进。中国第九战区所属第五十八军趁机于25日前后深入昭陵、淦田、朱亭(株洲、醴陵、衡阳、攸县之间), 袭击日军铁路及水路警备部队。经激战, 迫使日军从株洲、衡山增援。^⑥稍后, 日军又增调第二野战补充队一部, 南北夹击中国第五十八军, 第五十八军被迫东撤。与此同时, 在醴陵的中国第七十二军遭到日军第二野战补充队主力的围攻, 被迫撤退。在耒阳, 8月12日, 中国第九十九军占

① 张其昀:《抗日战史》,第426页。

② 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3卷下册,第733页。

③ ④⑤《湖南会战》下册,第78—79页;第84—85页;第77、102页。

⑥ 《湖南会战》下册,第126—127页。

领清水铺、公平圩之间地区，出击耒阳城；第三十七军进占耒阳县北部和常宁交界地区，牵制日军。22日，在中国第二十六军配合下，第九十九军出击耒阳以东3公里附近至姬头街附近地区。据第九十九军军长梁汉明1944年12月26日给军令部长徐永昌的电报称：奉薛岳电令，梁汉明统一指挥第一六师、暂八师及暂五十四师、第一四师各一部，自7月上旬始协同第二十六军“反攻击，经与耒阳南犯之敌，争夺拉锯至月半之久，卒于未寒（8月14日）将耒阳以南地区五千余敌全部击溃”，“九九师经浣溪市（属茶陵）击溃观音阁、通水铺、竹台圩一带之敌，于申支（9月4日）移抵耒阳以南附近，接替二六军攻击任务。申鱼（6日），猛力克复南京桥、阴田圩（耒阳城西10公里）等要点”。^①在此期间，第三十七军则西攻松柏、水口山（耒阳西北30公里）等地，与日军第一一六联队激战，稍后进军常宁。

在其它地区，如茶陵中国第四十四军与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的战斗也有声有色。上引梁汉明电称：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九、一六二师“拼力奋战，未东、未寒（8月1日、14日），相继克复萍乡、莲花，后更奉令，以一六二师向茶陵追击，归四十四军建制”。^②

9月初，中国第九战区经过近百天连续作战已势衰力竭，其主力相当一部又奉命南下参加“洪桥会战”，防范日军进攻粤汉线^③，所以只能在湘东山区与日军对峙。4日得蒋介石电^④后，战区更将主要精力用于内部整补，无心再战，历时70余天的茶陵反攻战以失败告终。这个时间刚好与日军发起洪桥战役的时间相衔接，表明长衡会战第二阶段的作战全部结束。

直到此时，蒋介石仍未放弃他两边夹、中间堵的战略。8月29

①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292页。

② 同上书，第1292页。

③ 同上书，第1292页。

④ 蒋介石9月4日电只通知薛岳转用第九战区主力于洪桥战役，并没有要求第九战区在湘东山区配合作战，参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309页。

日他仍电示白崇禧等：“一、敌主力正围攻衡阳，似有续向湘桂路及粤汉路进犯之企图。二、国军决固守桂林坚固阵地，依第六、第九战区之夹击，及第四、第七战区之协力，先击灭进犯湘桂路之敌。”（着重号为笔者所加）^①这个电令说明，蒋介石仍以衡阳为中心来思考作战，中国参战主力仍是第九、第六战区主力。不过，蒋介石根据衡阳已经失守的新情况，将原来计划的在衡阳中间堵改为在湘桂路湖南段两侧地区实施中间堵并预备以桂林作最后堵击地。

可以基本肯定，蒋介石对茶陵反攻战的要求是：8月8日以前配合衡阳保卫战；8至24日配合衡阳解围战；24日以后掩护中国军在湘桂路湖南段两侧地区组织防御。

到此，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蒋介石两边夹、中间堵是指导长衡会战的总战略，有别于豫中（河南）会战、桂柳（广西）会战的总战略。而蒋介石的这个战略又贯穿到9月初。如果以8月8日衡阳沦陷作长衡会战结束的标志，不符合长衡会战中中国方面战略安排的实际情况。

第二，长衡会战第二阶段4个战役在战略上互为整体，不可分割，各自作战规模都较大，在会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几乎同等重要。尤其是茶陵反攻战，其作战规模已超过了衡阳保卫战。因此，我们在书写战史时，就不应该象现在大多数战史那样，将其它3个战役作为衡阳保卫战的陪衬或策应来写，更不能只写第十军的战斗，而将其它3个战役从战史上一笔勾销。如果以8月8日衡阳沦陷作为长衡会战结束的标志，必然会割裂、模糊这4个战役之间的联系，造成长衡会战第二阶段仅有衡阳城保卫战的错觉。实际上，衡阳一城的战斗成为第二阶段作战最主要战斗的时间只有约10天时间；衡阳近郊解围战成为第二阶段作战关键的时间则有20多天，其中10多天的战斗发生在8月8日以后；而茶陵反攻战成为第二阶段主要战役的时间，却长达60多天。

^①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307页。

第三,8月8日以后的茶陵反攻战、衡阳解围战是以衡阳为中心进行的,因而仍属长衡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不妨再引用日军第十一军对8月中下旬战场情况的分析:“以第一期作战的经过来考虑,重庆军防卫衡阳的决心极为坚强。很明显,其一般的方针是企图一面坚守衡阳,一面由第九、第六、第四各战区进行合击,以击溃聚集此处的日军……敌在衡阳失陷后,仍会以美空军连续轰炸衡阳,摧毁其战斗力,切断后方联络线,孤立衡阳周围的日军,以便彻底予以击溃,尽可能夺回衡阳。”^①由此可见,8月8日以后的茶陵反攻战和衡阳解围战与8日之前的这两个战役的性质是一致的,战略上是连贯的。如果以8月8日作为长衡会战结束的标志,那么,很显然这两个战役就要被人为地分解:8月8日以前的战斗属长衡会战;8月8日以后的战斗属桂柳会战。而世界军事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即把同一地点、同一部队、为着同一作战目标且时间紧紧衔接的战斗分属为两个战役或两个不同名称的会战。

在众多同类战史中,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湖南会战》,是有关长衡会战最详细的著作。该书叙述了长衡会战第二阶段4个战役之间的整体联系(当然是从日军角度),如第五章标题为“挺进与攻打衡阳以及在外围的歼灭战”;第六章标题为“深入茶陵、莲花等地外围决战及第二次进攻衡阳”;第七章“企图解脱我对衡阳西部的包围与我第三次进攻衡阳”;第八章为“洪桥会战”;即以1944年9月7日日军攻战零陵(今湖南永州)为长衡会战结束时间。可见日方也不认为衡阳会战结束于8月8日。但该书有美化日军的倾向,对中国军的战斗多有忽视之处,特别是对8月8日以后的茶陵反攻战和衡阳解围战,冠之以“洪桥会战”之名,给人名实不符的印象。这一命名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该书所描写的衡阳近郊和湘东山区的战斗,绝大部分发生在日军进攻洪桥地区之前。

① 《湖南会战》下册,第90—91页。

另外,如果象现有大多数战史著述那样突出衡阳一城的战斗,我们不妨作如下反问:日军参加长衡会战的 36.2 万人除进攻衡阳城的 5 万人而外,其它的 31 万人在 6 月下旬到 7 月底长达 40 多天的时间,到底在哪里?从 8 月 8 日衡阳陷落到 9 月初日军进攻洪桥长达 20 多天的时间里,日军第十一军在干什么?是全部都在休整吗?长衡会战中日双方均记载日军伤亡 6 万余人^①,而衡阳保卫战仅歼灭日军 19380 人^②,其余 4 万余人到底在哪里伤亡的?如果象日本战史所称,日军 8 月中下旬主要都在休整,战斗规模似乎不大,战斗也似乎不激烈,那么,日本战史为何又称:自开始作战至 7 月 20 日日军战死战伤 12187 人,而到 8 月下旬日军死伤人员即达 6 万?^③难道蒋介石用于衡阳解围的十数万大军与日军仅咫尺之遥,且奉命进攻,未曾与日军发生激烈冲突吗?

所以,笔者对长衡会战第二阶段作战作如下概括:自 6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中日双方以衡阳为中心,在湘东山区和双峰、衡阳近郊等广大外围地区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8 月 8 日以前,日军企图以衡阳为诱饵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8 月 8 日以后,中国军企图夺回衡阳而实施反攻和侧击。

既然 8 月 8 日衡阳沦陷时长衡会战第二阶段的作战没有结束,怎么能以衡阳沦陷作为长衡会战结束的时间呢?

(作者单位:武汉工学院人文社科系)

(责任编辑:荣维木)

① 参见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第 151 页及《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 摘译》下册,第 314 页。

② (日)帝国陆军の最后,绝战篇》,第 7 章,第 33 页,转引自李守孔:《民国三十三年日本打通中国大陆作战之背景——美国战略之歧见与衡阳保卫战》,载《近代中国》1984 年第 42 期,第 48 页。

③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 摘译》下册,第 314 页。